

试论人工智能时代的“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路径

孔令昊¹，吴海朝²，唐彬彬³

(1.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2. 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3.

平江县颐华学校 初中学部，湖南 岳阳 414000)

摘要 在当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人文学发展的“功利化”倾向使其面临被裁撤的风险，“文科无用论”的质疑甚嚣尘上。人文学始终面临“元·反身性”的基本问题，不适用于所谓的“科学”标准，“对文科的质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而“对文科研究者工作特点的质疑”则质疑了人文学者相关研究的创新性，这对于人文学本身的发展是有益的。“元·反身性”问题使得人文学研究始终遵循一种“非全”逻辑。人工智能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重要的“尺度”，但它无法提供唯一的真理。“现代”人文学在行动上违背了“非全”逻辑，其与“人工智能”的耦合模型契合“树型”模式，其所表现的是唯一的虚构“整体”（权威）对于“局部”的压制。“非现代”新人文学承认“非全”逻辑，其与“人工智能”的耦合模型契合“根茎”模式，通过立足“局部”来想象“整体”，对于多元化的“视角”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要想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自己的发展路径，至少要遵循以下两种策略：其一是培养“非现代”新人文学思维，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启发式”知识生产；其二是借助人工智能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时刻保持批判精神，反思自己所依赖的“给定之物”，永远对“他异者”敞开空间。唯有如此，“非现代”新人文学方能在反思“现代”人文学种种弊病的基础上，始终拥抱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并深化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扩大自身的研究范围，从而参与到更为丰富的学术议题之中，以应对当今人类文明所面对的种种危机与挑战。

关键词 人工智能；“非现代”新人文学；“非全”逻辑；“启发式”知识生产；“被压迫者教育学”

1 问题意识缘起：人文学“功利化”倾向与“文科无用论”

2022年12月1日ChatGPT发布，引起了大众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的关注。2024年，我国的DeepSeek横空出世，激发了社会大众有关“人文学者是否将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全方位讨论。这一问题根植于全球性人文学科大衰退的背景，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国中找到许多案例：

在亚洲，印度在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时代就开始奉行“人文学科让位于科学”的基本教育理念。2015年，日本出现文部科学省“废除大学文科学部”的传闻。尽管最终被证明为虚假信息，但该传闻还是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在西方世界，自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时代开始，英国就要求大学的人文科系向政府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对经济收益有所贡献)，否则就会被减少资金支持甚至被撤销。2024年9月，根据相关消息，哈佛大学本科学院取消了至少20多个系30多门秋季课程，其中人文学科专业是重灾区。而在国内，同样出现了人文学科专业被大量裁撤的情况。2025年，复旦大学宣布将文科招生比例从原来的30%至40%压缩至20%。

上述现象所反映的是一种“功利化”的指导思想，强调人文学教育与学科发展助力社会、经济繁荣，即：文科必须有用(此处的“用”很多时候与经济因素相关联)。因此，张雪峰在一场直播中能够说出“文科都

作者简介：孔令昊(1996—)，男，江苏扬州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亚史、隋唐五代史、环境人文学、知识史、人类学理论、科学技术社会论研究，E-Mail: qq87255007@163.com。

是服务业”且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可，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我们还能发现，相当多的民众对于人文学的价值，其实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概念。例如：一些人认为人文学研究者应当引领国家对国际文化话语权的争夺。而如今能够对这项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如创作《三体》《流浪地球》等知名科幻作品的刘慈欣、执导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并在国际上取得优异票房成绩的饺子导演等——均非传统人文学科班出身。上述人群引领了我国国际文化话语权争夺战，不由得使社会大众质疑：传统人文学学科建设与培养模式能否适应时代发展与回应国家战略需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只是推动人文学科转型的最近一次、但也是迄今为止最猛烈的一次科技浪潮。早在2010年出版的《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一书中，美国知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就不无担忧地指出，“追求财富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越来越要求我们的学校生产出有用的赢利者，而不是培养出有思想的公民。在降低成本的压力下，我们恰恰剪除了对维持健康社会至关重要的那部分教育事业”。^[1]这迫使我们思考：“文科”真的无用吗？人文学究竟应该发展成什么样子？人文学科发展与人文教育朝着“功利化”的路径前进就能避免自己被裁撤的命运吗？

有学者指出，“文科无用论”的相关质疑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对文科的质疑”与“对文科研究者工作特点的质疑”。^[2]要想更加深入地理解“文科无用论”，我们就必须先讨论这两种基本质疑类型的实质。

在讨论这两种质疑类型之前，笔者需要先在此处简要论述人文学的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事实上，人文学始终无法避免一种被我们称为“元·反身性”（meta-reflexivity）的问题。“X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观点，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换言之，某个“文本”与观察该文本的“元·文本”，以及与进一步观察“元·文本”的“元·元·文本”无限重叠，形成了一种“俄罗斯套娃”（Matryoshka doll）式的“语言自我无限繁殖”之空间，“用‘话语’来研究‘话语’”使得相关研究在逻辑上陷入了一种“无穷倒退”“语义反复”的困境。如果p使得q发生，r又使得p发生，等等，那就必须有一个“终极因”（finality）来结束“等等”。但人文学文本（Text）被视为精心构筑的“人造物”（artifact）和一个永远无法被最终固定到单一中心、本质或意义上的“无限能指游戏”，因此宣称自己为某文本所有意义之起源的“终极因”是难以被接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文社科研究走向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谓的“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系谱学”（Genealogy）研究路径，即“群现”（Entstehungsherd）取代了“起源”（Ursprung）。^[3]人文学研究对于“无限能指游戏”的青睐，无疑受到了20世纪的符号学思想的影响。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学中，一个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即“语言的符号”）与“所指”（signified，即“语言所指涉的概念”）组合而成，其并未涉及实在对象。^[4]符号不必与实在对应，因而具有恣意性。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文科总是无法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回“对文科的质疑”，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文科的质疑”的实质，是对“科学”标准的超范围应用。可以说，用“科学”标准质疑“文科无用”的人，既不懂科学，也不懂文科（人文学）。很多人想象中的科学是发现客观真理的活动，其所生产的知识是脱离研究者的主观意志的，然而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与“科学技术社会论”（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已然动摇了“现代”科学研究依赖的“自然—社会·文化”二元认识论根基，揭示了“‘自然’借助‘人’的干预而予以呈现”的过程。¹相关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我们只需稍加涉

猎便可消除自身对“科学”的种种幻想。此外，“科学”本身所依赖的数学话语以及一系列规范化的形变与转译活动（这一活动被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称为“流动指称”[circulating reference]）²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前文提及的“符号失控”的“元·反身性”问题。也就是说，科学论文相对而言是标准的、规范的、透明的，能够最大程度削弱人们对于“文本”（Text）的感知。“文本”更多是“情境”（Context）的，这恰恰是人文学论文的特征。但事实上，在涉及某些需要综合各类学科进行协同研究的“超物体”（hyperobjects）³问题时，这种“符号失控”同样难以避免。

“符号失控”的特性使得人文学观点无法被简化为一套公理。我们可以援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中所提及的“作者”（l'auteur）问题来予以理解。福柯在书中叙述了科学与文学话语秩序演变的差异：自17世纪以来，科学领域的作者权（l'attribution à un auteur）被不断消除，变成一条定理、一个效果、一个例子、一个症候群；但在文学领域，在同一时期，作者的功能被加强。^[5]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可以不用关注定理的提出者，而只需要使用这一定理即可，但人文学研究需要注意各理论的提出者，原因在于人文学理论很多都表现出“私人化”的特征，其所体现的是作者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因此，我们的人文学研究者在使用理论时，必须关注理论提出者的学术风格、所属学派及其思想谱系。这使得人文学研究者无法对自己的知识体系公理化，因而会存在福柯所谓的“知识型”（épistémè）断裂。⁴但正是因为这种“不可公理化”，人文学研究永远不可能被一种绝对的“思维方式”所统一。这一点容笔者在后文予以讨论。

“对文科研究者工作特点的质疑”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讨论人文学研究者的回溯性知识生产模式是否会被高度发达的算法所替代。概而论之，自然科学工作者与当今人文社科研究者的知识生产模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正在“生成”的，而后者关注的对象永远是“历史”的。当今文科研究者的工作特点可以被概括为“改写式诠释”与“套用式应用”。^[6]这表明文科研究者的工作是标准化、结构化、创新性弱的，因此人文学研究需要不断重复前人的观点。如果人文学研究者唯学界主流马首是瞻，只会跟随所谓“学术大佬”的脚步，而不去思考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努力进行创新，那么他们的研究工作就很容易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替代。

上述质疑对于人文学本身的发展而言，是极其有益的。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反思“现代”人文学的研究路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构建“非现代”的“新人文学”研究路径。早在上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就提出了一种“新人文学”构想：新的人文学应当教会人类一种基于“科学—（连字符/关系）—人文学”三元模式的新思考方式。^[7]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人工智能与人文学关系的问题亦多有讨论。但相关研究仍然不够深入，存在将“人文学”特征进行误读的倾向。基于此，笔者在讨论“人工智能与‘现代’人文学以及‘非现代’人文学之‘耦合’模型”的基础上，聚焦于人工智能时代的“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路径的建构。

2 虚构“整体”还是立足“局部”？——人工智能与“现代”人文学以及“非现代”人文学的“耦合”模型

“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大语言模型，其并未以任何现代逻辑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理论为指导，而只

是依靠海量数据支持的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模型就达到了如此性能。^[8]某种程度上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捕捉数据中的潜在模式和关联性,生成符合统计规律的新内容。赵汀阳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所采用的似乎是贝叶斯(Bayes)方法论。^[9]这种判断的前置基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仍然属于‘图灵机’(Turing machine)的范畴”。但也有学者指出,大语言模型并非“图灵机”,也不是约翰·塞尔(John Searle)所谓的“中文屋”(Chinese room),而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提出的“阅读机”(reading machine)。^[10]但上述讨论显然都有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简化的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并非“图灵机”本身,但它建立在“图灵机”的计算逻辑之上。我们同样能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作“统计学版中文屋”,但相较于“中文屋”更加具有复杂性与实用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技术升级版的“阅读屋”,它通过统计学方法实现了更复杂的语言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符号操作”与“意义理解”之间的鸿沟(但这种弥合多半只是一种掩盖,并非真正跨越)。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算原理可以被划分为“概率预测”与“链式思维”(Chain-of-Thought)两类,前者适合快速反馈,处理即时任务,后者通过推理解决复杂问题。了解它们的差异有助于根据任务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型,实现最佳效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维推导过程尽管会产生“AI幻觉”(AI Hallucinations),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创新。大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与人文研究者理解的推理能力略有不同,它的推理过程中都带有概率,这种推理方式与传统的推理方式相比更加具有发散性,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由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人工智能为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尺度”(scale),但它从来没有允诺自己能够提供唯一的真理。“现代”人文研究者以及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似乎如此肯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带来唯一真理,以至于他们坚信:“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取代人文学者。为什么“现代”人文研究者会有这种想法?笔者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到“现代”人文学与“非现代”人文学的特性。笔者已经在前文简要论述了人文学研究的基本特征。而“现代”人文学与“非现代”人文学的差异就体现在其对于人文学研究基本特征的态度

“符号失控”的“元·反身性”问题,使得人文学研究无法被固定在一个终极因中,当“群现”取代“起源”时,人文学也就表现为对“整体”之暴政的反抗。事实上,一个与“个体”相对立的“整体”是可疑的,这个“整体”往往是被人虚构出来的、“先验”的、机械化的、简单化的装置。不能将任何事物简化为某一“整体”的部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事物重新界定为另一“整体”的部分。^[11]正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为人文学研究所提供只是一种“尺度”。“尺度”可以被理解为赋予现实体验以维度的技术,它通过区分“部分”与“整体”的方式将“部分”置于想象的“整体”之框架中并建构出一种脉络感。不同的“尺度”会相互参照,通过“类比”(analogy)来构建局部关联,或通过“对比”(contrast)来进行分化。“尺度”本身总有遗漏。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人文学”研究,必然是“非全”的。

我们也可以用数理逻辑来推导这个结论。设A为一个集合,表示“‘新奇而他异者’所包含的全部文化现象、实践、符号以及意义系统”,设B为另一个集合,表示“人文研究者自身所掌握的全部概念、理论与范畴体系”。人文学实践试图以研究者所掌握的推导规则去“解码—编码”另一个集合的复杂性,并验证这种编码的有效性,这一过程可以被表示为一种映射 $f: A \rightarrow B$ 。当且仅当f实现“单射性+满射性”(或者说是“双射性”[bijective])时,人文研究者所掌握的“推导规则”具有完全解释效力(但不足以主张

其普遍性)。“单射性”(injective)指:对于任意 x, y 属于集合 A , 如果 $x \neq y$, 则必然有 $f(x) \neq f(y)$ 。

“满射性”(surjective)指:对任意 b 属于集合 B , 至少存在一个 a 属于集合 A , 使得 $f(a) = b$ 。当这两个条件都成立时,“新奇而他异者”的每一个“社会·文化”元素均可被精确地映射至研究者所掌握的“推导规则”中。然而,根据康托尔对角线论证(Cantor's diagonal argument),如果集合 A 是一个不可数无穷集合(“新奇而他异者”总会涌现,呈现出复杂性与未知性),而集合 B 是可数的有限集合(研究者所能掌握的“推导规则”总是有限的),则不可能存在这种双射 $f: A \rightarrow B$ 。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只需在“假设集合 A 为可数有限集合 A' ”的前提下,证明“从可数有限集合 A' 到集合 A' 的幂集 $P(A')$ 之间的任何函数 f 不是满射函数”即可。这意味着 $P(A')$ 中的某个成员 T 不在函数 f 的映像中,即: $T = \{a' \in A' : a' \notin f(a')\}$ 。对于集合 A' 中的每一个 a' , 要么 a' 在 T 中, 要么 a' 不在 T 中。如果 a' 在 T 中, 那么根据 T 的定义, a' 不在 $f(a')$ 中, 所以 $T \neq f(a')$ 。如果 a' 不在 T 中, 那么根据 T 的定义, a' 在 $f(a')$ 中, 则同样 $T \neq f(a')$ 。

由此可见,可数有限集合 A' 及其幂集 $P(A')$ 之间的函数 f 不可能是满射函数,因而不存在双射 $f: A' \rightarrow P(A')$ 。要想满足双射条件,集合 A 必须是不可数无穷集合。但集合 B 却是可数有限集合,无法覆盖不可数无穷集合 A 的幂集 $P(A)$, 则不可数无穷集合 A 与可数有限集合 B 之间的函数不可能是满射函数。因此,在“集合 A 是一个不可数无穷集合”以及“集合 B 是可数的有限集合”的情况下,不存在双射 $f: A \rightarrow B$ 。人文学研究者所掌握的“推导规则”永远无法精确映射和覆盖“新奇而他异者”的文化世界集合。换言之,人文学研究必然是“非全”(Non-all, $\neg \forall$)的。我们还可以从康托尔的“超穷数”(transfinito)来理解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取任意一个集合,计算其元素,然后将计算出来的数量与这些元素可能的分组的数量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对集合 A 的元素进行分组后得到的可能的分组数量 B (即幂集)总是大于 A 。即便 A 为无穷大,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由无限集合组成的无穷序列,序列中的每一个集合都在数量上大于其幂集。但这个序列本身却无法被全体化,假使数量上的全体化存在,这一集合也难免被超越的命运。^[12]在齐泽克那里,客体自身的差异导致了主体在认识论层面的差异。客体之所以与自身存在差异,是因为其内部有着“在它之内而非它”的“小客体”(“对象 a ”),这个小客体为主体所预设,使得“视差分裂”成为可能。因此,我们看到的“实在”“总体”从来都是“非全”的,因为它们包含着盲点(“小客体”或“对象 a ”)。^[13]也就是说,“可被思考之物”的“全体化”不再具有任何必然性。

“现代”人文学虽然在口头上承认这种“非全”逻辑,但他们崇拜“学界主流”“学界权威”,极力打压“非主流”“非权威”知识话语,在行动上恰恰违背了“非全”逻辑。追求“可度量性”(scalability)的“现代”人文学,其研究过程中必然有“非可度量”的成分,研究者纠结“何种‘尺度’能够完全代表‘整体’”是毫无意义的。但人工智能的出现仿佛给“现代”人文学研究者带来了救赎。因为长期崇拜“学界主流”“学界权威”,这些“现代”人文学研究者早已丧失了批判精神,而惰于人文学的复杂思考,妄图用单一的绝对“尺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而这种绝对“尺度”很多时候指的是一种想象的“价值无涉”之“尺度”。基于数学话语的“人工智能”恰恰提供了这种虚构的“整体”尺度(即使人工智能自身并未允诺绝对“整体”)。以经过人工智能背书的“学界主流”为“整体”,其余“局部”必须统一隶属于这个主干,只能进行有限度的对外拓展,这种“人工智能”与“现代”人文学的耦合模型契合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树型”(arborescence)模式:它以“是(be)……”的形式被定义。^[14]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中，“下定义”是通过“属+种差”的方式揭示某个事物的本质，以将其与其他事物相区分。^[15]诚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这种“还原论”（Reductionism）的逻辑不适合“人文学”，因为“人文学”文本被视作“一个永远无法被最终固定到单一中心、本质或意义上的‘无限能指游戏’”。“人工智能”与“现代”人文学之“树型”耦合模式的形成，大概有着以下几点原因：（1）“现代”教育学所培养出的“恋死癖”（Necrophily）⁵ 世界观使得我们更喜欢确定的、静止不动的、可被还原的事物；⁶（2）与“恋死癖”世界观相伴随，“现代”霸权科学所带来的“科学知识之绝对真理”的幻象，以及“科学”领域研究者对“人文学”持续性的无脑贬低与苛责，使得我们迷信所谓“确定无疑”的科学，轻视“人文学”的思辨活动，“现代”人文学研究者自然也不能免俗；（3）全球性的人文学“功利化”浪潮使得人文学者无法进行思想上的创新，只能随波逐流地进行“标准化”研究以获取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科研经费支持与社会理解，而“人工智能”恰恰提供了这种“标准化”研究所需要的土壤。

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如果学界主流（或者学术前辈们）已经建构好了一个不允许后人反驳的知识体系（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人工智能”也只是被用于论证该知识体系的正当性，而并非用于创新），而人文学的学术研究就是要与主流认识吻合，并论证主流认识无比正确，那么还要人文学研究者做什么？人文学本身不会被技术的发展淘汰，但如果人文学研究者都一门心思地想着迎合学界主流认识，而完全不去反思（或者不被允许反思）这些主流认识是否合理，那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末日。毕竟，只说别人想听的话，唯“权威”马首是瞻，这种事情谁都会做，人工智能可能比这帮人做得更好。因此，完全不需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来供养一批专门为“权威”们唱赞歌的“现代”人文学研究者。

“非现代”新人文学不惮于承认这种“非全”逻辑。根据康托尔的超穷数，“可被量化的全体性”无法被思考，则朝向“频率/概率”的论证失败，这便预示着“必然性”的失效与“偶然性”的回归。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指出，“存在”是“纯多”，但作为“纯多”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可思的。一切思想都以可思之物的某一“情势”（situation，也可以被称作“多元”[multiplicité]）为前提，即一种“计数为一”（compte pour un, count-as-one）的操作。^[16]巴迪欧对于“一”与“多”之关系的处理借鉴了集合论“属于”（belonging, \in ）的数学逻辑，^[17]即：“多”必须在与“一”相联系的情况下方能被理解。既然“纯多”是存在论（Ontology）层面的，我们就没有必要预设一个完全确定的、具有超越性的“总体”并以此来认识“多”，而应该在“纯多”的无限生成中寻找一个接触“整体”的局部锚点，进而想象并计算一个动态的、“非全”的“整体”。“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者对于多元化的“视角”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因为他们清楚不存在一种虚构的绝对“整体”（其所带来的是一种绝对“尺度”）。由此，“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立足“局部”，通过对“局部”的研究来想象动态的、复数的“整体”。在这一层面上，“人工智能”的发散性推理方式能为相关研究者带来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尺度”。著名数学家陶哲轩（Terence Chi-Shen Tao）就指出，应该让 AI 扮演合作者的角色，要求它提供策略建议。^[18]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与“非现代”新人文学的耦合模型呈现出“根茎”（rhizome）模式。“根茎”不像“树型”，它通过“……与……与……与……”（...and...and...and...）的“关系型”（relationship）进行连结，从而构建出“局部关联”（partial connections）。这种模式是多元的，既能形成自身的结构，又能通过结构中的“逃逸线”形成断裂，进而生成新的结构。^[19]“人工智能”的发散性思考能可在“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中起到“逃逸线”的作用，为相

关研究对旧有知识体系的批判以及面向未来的创新提供帮助。

3 “启发式”知识生产与批判精神：人工智能时代的“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路径

“非现代”新人文学不是从“现代”人文学走向它的反面：反对一切“现代”人文学所给定之物。如果说“现代”人文学是“蠢笨的人文学”，那么上述反对一切“现代”人文学所给定之物的人文学恐怕就是“完全没有大脑的人文学”。事实上，“非现代”新人文学是一种重新分配的策略，即对上述两种人文学的知识形式的重新分配。例如：“现代”人文学执着于追求“绝对客观真相”，反对一切“现代”人文学所给定之物的人文学选择直接拥抱“虚构”（fiction）并嘲笑一切追求“真相”的行为，但“非现代”新人文学则是在承认自身研究之虚构性与有限性的基础上去努力追求“真相”。上述三种人文学表现出不同的知识品格。

笔者认为，在当今人工智能逐渐发展的时代，“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要想构建自己的发展路径，至少要遵循以下两种策略：

其一，我们需要培养“非现代”新人文学思维，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启发式”（heuristic）知识生产。

“非现代”新人文学思维的突出特质是对“起源”“目的”“进步”“必然”等线性观念的反叛，因而需要摒弃“超历史的历史学”并转向“系谱学”。系谱学强调具体事件的“群现”（Entstehungsherd）以抵抗形而上学所规划的线性史观，其目的在于摧毁宏大的、统一的、目的论式的元历史叙事。这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具有怎样的特质。诚如前文所述，人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基于“符号失控”的“元·反身性”问题，这种问题是由“话语”（discourse）带来的。福柯指出，“话语”的生产被一定数量的“程序”所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这些程序可以被粗略划分为“排斥程序”（历史的、可修改的、机构性约束的系统）、“内部程序”（“游戏的程序”，指向“事件”与“偶然性”）与“许可话语控制的程序”（“话语屈从程序”）。^[20]“新人文学”要做的“系谱学”研究就是围绕“话语”展开工作，揭示上述话语生产程序的相互关系，尤其要重视“话语”稳定性边缘的区域，这里是不同话语相互碰撞、纠缠的地方。^[21]

研究者使用自身所依赖的“话语”去研究“他者”的“话语”时，在“分析”（analysis）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虚构”的情况。玛丽琳·斯特拉森（Marylin Strathern）将分析视为“一种合适的或可被控制的虚构”（analysis as a kind of convenient or controlled fiction）。^[22]这是因为理解“异文化”的努力必须从对“文化”的“发明”行为开始。^[23]“完全融入当地文化”的设想是天真的，这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文化（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沉迷于我们自己的表征策略也是危险的，因为不能假设我们自己的语境和“他者”的语境是可以完全勘同的。某种程度上而言，作为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自身也处于“自然/社会/文化/政治”的环境中。这迫使每一位人文学研究者去思考如下问题：“你人在哪里？你如何受到保护，免于灭绝？你呼吸怎样的空气？你怎样取暖，怎样穿着，怎么进食？如果你无法满足这些生命基本需求，你怎么会仿佛站在道德高位，怎么会一直想要谈论真实和美好？你试图捍卫的价值有怎样的空调系统？”^[24]没有这样的自觉，不去直视这样的现实状况，则人文学研究无从谈起。因此，“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从不惮于接受“虚构”与“偶然性”（contingency）。

为了应对“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所带来的话语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通过“多声性”（polyphony）叙事来尽可能展现每一种不同的话语，从而呈现出碎片化

的特征。但问题在于，研究者所想象出来的“碎片化”不可能来源于一个本身就“碎片化”的世界。^[25]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关联的。无论是现代的“总体的”，抑或后现代的“碎片的”，都没有展现出“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相互介入的状态。“非现代”新人文学通过并置(juxtaposition)不同文脉下的话语体系，在相关话语之间构建局部关联，引导研究者重新思考使自己相关认识得以形成的存在论基础，进而发展出新的审视问题的角度，“唤起”(evocation)一种全新的“启发式”(heuristic)知识话语。在这一基础上，人工智能思维方式的发散性与不确定性恰恰能够为“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考问题的“视角”，它甚至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同行评议、检验内容编码等评估性建议。

当然，我们不应该奢求人工智能为人文学问题提供终极答案，也不应该将人工智能提供的思路视作一种绝对尺度。那种认为“人工智能终将取代人文学研究者并解决所有人文问题”的“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logical Utopianism)思想，毫无疑问是愚蠢的。2024年，来自悉尼大学、利物浦大学等高校的研究者在《组织理论》(*Organization Theory*)期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语言模型与组织理论的未来》(“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the Future of Organization Theory”)的文章。该文章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无法为学术界带来颠覆式创新，因为它的向量算法仍然受限于“句法结构”，因此倾向于在相似的词汇和概念矩阵之间建立联系，而非颠覆式创新。^[26]正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不是上帝，我们应该让人工智能扮演合作者的角色，要求它提供策略建议，而不是要求其提供某种绝对真理。

其二，“非现代”新人文学需要借助人工智能，以获得一种“连字符”的智慧，但同时又需要保持批判精神，时刻反思自己所依赖的“给定之物”，并永远对“新奇而他异者”敞开空间。

米歇尔·塞尔提出的“朱庇特”(Ju-piter)案例生动地说明了“非现代”社会的特征：物理学澄清了“Ju”(太阳光)，人文学科阐明了“piter”(父亲)，但“宗教·哲学”却从连字符的缺席处回归。^[27-28]“现代”社会进行了两端的工作，但忘记了将二者进行联结，而“非现代”社会则要完成“连字符”处的联结工作，作为“非现代”社会之重要支柱的“非现代”新人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布罗代尔寻求一种“综合科学”，而综合科学就是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所有学科的继承与超越。^[29]这种建议实质上就是强调人文社科的整合，是对人文社科专业共同体的呼唤。但是，当今世界中的各要素相互共生，彼此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仅仅依靠人文社科的力量还不足以做好相关研究。^[30]尤其是在面对环境人文学(Environmental Humanities)以及STS、SSK等跨学科领域时，“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者必须与自然科学研究者结成人类知识共同体，多学科协同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由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文学研究者不可能精通所有科学领域，这时候就需要人工智能提供相关信息，以弥补研究者知识体系的空缺。唯有如此，“非现代”新人文学才能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获得一种“连字符”的智慧。

相关研究者在进行跨学科合作时，同样需要保持批判精神，时刻反思自己所依赖的“给定之物”。所谓“给定之物”指的是研究者自身认识得以构筑的存在论基础。如前文所述，“非现代”新人文学通过并置不同的话语体系，使研究者从认识论问题转向了存在论问题，主动分析自己的存在论决定。在这样的“反身性”思考中，研究者所虚构的任一“知识”背后稳固的认识论领域都将被破坏。即使是我们使用的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佐治亚州立大学的阿伦·雷(Arun Rai)教授指出，人工智能的学习算法，尤其是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决策过程让人难以理解，因此有必要开发“可解释人工智能”(XAI)以解决这一问题。^[31]这表示，我们在

进行任何人文学研究时，都需要时刻反思自己知识体系背后所隐藏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在这样一种情境中，唯有通过“溯因推理”（Abduction）⁷的方式，“非现代”新人文学才有可能不再停留在对过去与现在的描述与归纳，而是试图超越既有的思维惯性，主动拥抱一种指向未来的“希望”（hope）：在特定情境下，某种现象终将浮现。^[32]经由这种方式所形成的认知结构总是“非全”且不稳定的，因而能够引申出更多思考问题的角度。很多时候，“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者宁可进行“错误”的思考，而不是复读“必然正确”的废话。因为前者虽然“错误”（所谓的“错误”一些时候也只是不为主流认识所接受），但能引发社会公众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入讨论，而后者就只是“正确”而已，甚至这种“必然正确”往往也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虚像。如果说在“非现代”新人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有什么是必然的，那只有“与‘新奇而他异者’的偶然相遇”是必然的。在这样一个偶然相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向‘他异者’无条件献祭‘自我’”，也不应该抱有“主宰‘他异者’”的狂妄想法。“非现代”新人文学所强调的正是一种“永远对‘新奇而他异者’敞开空间”的态度。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与麻烦共存：在蜘蛛世制造亲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一书中指出，“蜘蛛世”（Chthulucene）既不会自我封闭，也不会四舍五入，它的接触区无处不在，并且不断长出环状的卷须。^[33]这正是一种“非现代”人文学的“触手思维”（Tentacular Thinking），它要求我们不断与“麻烦”的“新奇而他异者”共生，如同前文所提及的“根茎”模式那样，去创造“局部关联”。

尽管在当今世界，人文学的“功利化”已不可避免，但“非现代”新人文学仍然应该构建一套全新的教育培养体系以应对其所面临的“数字·科技霸权”的压迫，同时挽救自身的批判精神。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或能提供一种新思路。传统的“现代”灌输式教育强调讲解，教师成为赐予学生知识的权威，而被认定为“需要教育”的学生们则被动记忆教师讲述的内容。学生们没有任何认知实践，因为认知行为所指向的客体是教师的所有物，不是唤起师生双方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媒介。^[34]但正如笔者前文所述，教师教授的知识存在着怎样的空调系统？他们试图捍卫的价值观又是什么？不去思考（或者说“不被允许去思考”）这些问题，则学生们无法形成批判精神，“非现代”新人文学研究自然无从谈起。更何况，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益发展的当今时代，人的学习模式本身就迎来了重大变革，知识与信息的保存和记忆交给了电脑、手机以及人工智能，而人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前那种教师（权威）对于学生的“无能推定”（*présomption d'incompétence*）已然被颠覆。⁸一位自入职以来就躺在教师编制上混吃等死的所谓“权威”，其对于特定领域的认知甚至有可能不如被他进行“无能推定”的学生们。“现代”灌输式教育逐渐走向它的终点，我们迫切需要能够培养学生人文思辨能力与批判精神的“被压迫者教育学”。这种教育学提倡提问式教育，通过对话的方式，教师与学生成为共同探索世界的合作者，使得学生参与到对自身的解放之中。“人形成了批判性地认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方式的能力，他们发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并与之共存”。^[35]“非现代”新人文学的批判精神由此得到培养。当然，具体的教育体系改革是相当复杂的，这牵涉到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笔者在此仅仅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学术界能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4 结 论

笔者在前文业已指出，人文学以及人文学研究者本身不会像很多愚蠢的“文科无用论”或“技术乌托邦主义”鼓吹者所说的那样，被技术的发展淘汰。但如果人文学研究者还在遵循“现代”人文学的发展路径，迷信霸权“科学”，对人文学自身的思辨能力与批判精神不屑一顾，那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末日。但不幸的是，过于依赖人工智能，使得我们人文学研究者正在加速自身被科学技术所淘汰的进程。

在《拇指一代》（*Petite Poucette*）中，米歇尔·塞尔将依靠数字技术的“新人类”（她们被亲切地称作“拇指一代”[或者说“拇指姑娘”]）比喻为手持自己头颅的“圣德尼”（*Saint Denis*）⁹：

“今天，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手持自己头颅的画面。每天早晨，当我们打开电脑，面对我们的邮件、文档和软件，我们不都多少有点像德尼吗？我们也一样，把自己‘装得满满的’头割了下来，放到电脑上了。它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的无头之躯还剩下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空脑壳里还剩下什么？莱昂·博纳在表现圣徒德尼的殉道场面时（这幅画今藏于巴黎先贤祠），在断头的部位画了一簇光。这恰恰就是为我们剩下的东西：当我们的认知功能外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就注定要变得聪明起来。‘装得满满的’脑袋（知识）和‘健全的’脑袋（软件）都一股脑儿甩出外面来了，掉进了电脑这个便携式脑袋之中。留给我们的创造性与适应性。幸好，这一点恰是彰显了人类的特征。”^[36]

也就是说，“拇指一代”就像捧着脑袋的圣德尼，她们把知识储备的工作交给电脑、手机甚至人工智能，自己只负责创新与思考。然而在人工智能日益发展以及“现代”人文学研究与相关教育越发呈现出极大问题的当代，如果我们人文学研究者连创新与思考都交给了电脑、手机或人工智能，那我们恐怕就不是提着脑袋走到目的地的圣德尼，而是当场暴毙的圣德尼了。“非现代”新人文学力图在反思“现代”人文学种种弊病的基础上，始终拥抱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并深化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扩大自身的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STS与SSK就是很典型的案例），从而参与到更为丰富的学术议题之中，以应对当今人类文明所面对的种种危机与挑战。

诚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述，“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已经成为我们这种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的一种鲜明特征：无条件忠实于“常识”（套语的独裁）、无条件忠实于经济利润（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压制人文学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庸俗的霸权“科学”就是一切）。^[37]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非现代”新人文学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契机，守卫着人类最后的良心。用米歇尔·塞尔的话来说，人类中最后一批守护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的人是人类苦难的保管者。在绝对知识面前不屈地见证普世的不幸，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文学，知识就等同于不负责任的无知，而无知的“天真”又再次构造出一个没有宽恕的世界。^[38]我们只需回顾一下20世纪的“反乌托邦”（*Anti-Utopia*）三部曲所描绘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¹⁰之未来，¹¹便不难理解“非现代”新人文学之批判精神的价值。愿我们的人文学者能够构筑互相沟通的可能世界（*worlds*），成为在“泛托邦”（*Pantopie*）中传递信息的“赫尔墨斯”（*Hermes*），¹²而不是当场暴毙的圣德尼。

注释

¹ 相关研究参考：（英）大卫·布魯尔著：《知识和社会意象》，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著：《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张伯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美）约瑟夫·劳斯著：《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² 在康德的透视法中，现象存在于不可触及的物自体与活跃的自我所做的分类工作之间的交汇点；在流动指称中，现象是通过

一连串的形变而经常性地流动的东西。科学家口中的真理不来自对社会、惯例、转义、联系的突破，而是来自流动指称所提供的安全性。流动指称通过大量的形变与转译，改变和限制众人无法长久控制的言语行为。参考：（法）布鲁诺·拉图尔著：《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史晨、刘兆晖、刘鹏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98页、第129页。

- 3 “超物体”概念源自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指的是相对于人类而言，在时空量级上有着巨大分布的物，如全球变暖、温室效应、黑洞、油田、生物圈、太阳系、龙卷风、海啸，甚至化学元素、苯乙烯泡沫塑料、种族、阶级或资本主义轰鸣的机器等都是“超物体”的化身。时空无限性是“超物体”最为显著的性质，这意味着人类无法对其进行完全掌握，而只能求助于统计等手段。参考：Timothy Morton. *The Ec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 这一概念取自米歇尔·福柯所著《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一书，这部著作以符号学思想为基础，讨论人文学科中的“知识型”变化。本书的英文版、德文版书名都是“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Die Ordnung der Dinge*），这是福柯本来想要使用的书名。尽管涉及了“物”这一主题，但福柯聚焦的更多是语言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而非自然科学。所谓“知识型”指的是：特定时代的知识话语得以形成的规则。在这个规则的作用下，某一特定时代的“对象”也由此被重构为另一个时代的“其他对象”。参考：（法）米歇尔·福柯著：《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 5 用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话来说，“恋死癖”世界观的一大特质便是“虐待狂”：为了便于控制，“现代”填鸭式教育想方设法打消人们的探索欲望，抑制人们永不满足的精神，抹杀人们的创造力，越来越多地把科学技术当作无可争议的强有力工具来实现其目的：通过操纵和压制来维持其既定秩序。而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们则异化为“物”，除了“现代”教育给他们规定的目的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久而久之，他们也被塑造出了“恋死癖”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最终导致了“人文学”的式微，因为人文学强调不确定、生成的冒险。参考：（巴西）保罗·弗莱雷著：《被压迫者教育学》，顾建新、赵友华、何曙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第20页。
- 6 在2023年初北京大学考古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与哲学系合办的有关“数据主权”的研讨会上，有学者甚至指出，“如果一种行为（例如乘坐地铁）的数据无法收集，这个事实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就不存在，说明这些数据承载的行为对新的文明毫无价值——这些内容无法被带入新的时代”。这无疑是一种“数据化的平民灭绝”。事实上，这不禁让笔者联想到了著名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所提及的问题：“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东方人群没有个性，没有个人特征或个人经验，被简化为“态度”“趋势”或统计数据之类的东西，简言之，被非人化了。参考：（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67页、第373页。
- 7 我们在进行人文学研究时，通常遵循“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两种路径。归纳推理从观察开始，提炼假设之后再行验证。演绎推理是从规则的构建出发，先设定一个论点，接着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而“溯因推理”则直接将观察到的事实与可能的规则迅速对接，通过直觉式的推断迅速得出结论。相比演绎推理的严谨逻辑性和归纳推理的稳健经验性，溯因推理看似稍逊一筹，但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为直觉与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因此，溯因推理既能运用于理论建构，也能用于实证研究：一方面，它可以孕育出富有启示性的假设，另一方面，又能引导我们在具体情境中加以检验。参考：春日直樹著：《人類学と社会学の未来に向けてのメモランダム》，《フォーラム現代社会学、特集I: Teaching Sociology, イメージとしての社会学》2005年第4卷，第21页。
- 8 “无能推定”指的是：上位者（权威，如：媒体、广告、官僚、企业、学府、医院、科学等）先入为主地认为下位者（所谓“公众”人群，如病人、学生、工人、农民等）认知能力低下，或者说没有认知能力。（法）米歇尔·塞勒著：《拇指一代》，谭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1—72页。毫无疑问，这种“无能推定”违背了人文学的基本理念。更加吊诡的是，这些上位者在对下位者进行“无能推定”的同时，似乎也忘了自己也是“公众”的一员。事实上，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布鲁诺·拉图尔对于柏拉图（Plato）《高尔吉亚篇》（*Γοργίας*）的解读：作为“怨恨者”（men of resentment）的苏格拉底（Socrates）将雅典民众从他们基本的社会性、道德、技能中剥离出来，将他们描绘成孩子、猛兽和被宠坏的奴隶，于是愤怒的雅典民众迫使苏格拉底服毒自杀，因为他不属于公众的一部分。参考：（法）布鲁诺·拉图尔著：《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史晨、刘兆晖、刘鹏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348—350页。
- 9 圣德尼是公元3世纪卢泰西亚（Lutèce，今法国巴黎）地区的主教，弗拉津的雅各（Jacobus de Voragine）编写的《金色传奇》（*Legenda Aurea*）一书记载了他的传说。圣德尼在传道时被罗马人逮捕并被判斩首，推到后来被称作蒙马特（Montmartre）高地的山丘上处决。行刑当天，走累了罗马人于半道上处决了圣德尼。但在行刑后，圣德尼的身体站了起来并将自己的头颅拿在手上，向山丘走去。圣德尼在一处泉水旁洗净了自己的头颅，又继续走了六公里，将头颅交给一个女人后倒下。人们在原地将他埋葬，后来又修建了一座圣德尼大教堂。
- 10 “全景敞视主义”来源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一种监狱建筑模型，在这里福柯将其普遍化、抽象化地应用于他的规训权力理论当中。全景敞视建筑简单来说就是在中心设置瞭望塔，四周为环形建筑，后者被分为若干小囚室。大的瞭望塔可以看到任何一间囚室内部的场景，被囚禁者以一种被隔绝、被观察的孤独状态存在，而这种状态能够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一切都以“监视”为核心。囚犯的境遇变成了：“他可以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由此，福柯的权力理论建立起了初步的模型：权力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而是内在于普遍的社会关系、社会机构当中；同时这种权力关系能够对个体进行无意识化的控制，此时个体并未意识到主体性正在被规训权力所塑造；最后，这种权力关系不是静止和永恒的，而是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参考：（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5页。
- 11 “反乌托邦”三部曲指的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叶甫盖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Мы*）以及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这三部著作都讨论了极权式“乌托邦”对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束缚。参考：（英）乔治·奥威尔著：《1984》，刘绍铭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俄）叶甫盖尼·扎米亚京著：《我们》，陈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英）阿道司·赫

胥黎著：《美丽新世界》，宋龙艺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年。

- 12 “泛托邦”（Pantopic）一词来源于“泛托普”（Pantope）。“泛托普”取自希腊文“pan”（全面）与“topos”（地方），其名寓意“整个世界”。这个人物出现在米歇尔·塞尔的《天使传说》（*La Légende des anges*）一书中。这本书安排两位人物接触：泛托普与琵雅（Pia），一位是男性，一位是女性。泛托普是工程师，总是对事物保持怀疑；琵雅是文科人，性格感性情绪化。他们在一座机场相遇，讨论现今这个沟通型世界。塞尔由此将这种沟通型世界称作“泛托邦”。“泛托邦”不是“乌托邦”（Utopia），“乌托邦”是不存在的虚构地区，而“泛托邦”就是当今世界，其特征是全球各地的人类都能相互往来。“赫尔墨斯”（Hermes）在古希腊神话中是人类传令官、旅行者、盗贼、商人和演说家的保护神，是诸神的使者与信使，能够快速而自由地在人间与神界移动。塞尔曾借用这一意象创作了共五册的《赫尔墨斯》系列著作（1969—1980）。在书中，塞尔以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代表蓝领工人，以赫尔墨斯代表白领，并赋予其使者与译者的身份。在当今世界，赫尔墨斯取代了普罗米修斯，这意味着沟通交流的范畴（信息化的世界，同时也象征一种“信息存在论”[ontologie de l'information]，这种“信息存在论”的一个重要知识源头是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和莱昂·布里渊[Léon Brillouin]的信息理论。事实上，二人参考了热力学中的“熵”[Entropy]这一概念，并发现：信息与“熵”有直接关联）取代了生产的范畴（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工业革命的世界，同时也象征热力学）。赫尔墨斯是使者，而希腊文“使者”（angelos）正是基督教天使（angel）的词源，因此在塞尔的类比体系中，赫尔墨斯就是“天使”，也就是说：一切“转译”信息的“使者·天使”都属于“赫尔墨斯”家族。就这一点而言，前文提及的“拇指一代”（或者说“拇指姑娘”）、“泛托普”与“赫尔墨斯”是同族（具有相似的意涵）。参考：（法）米榭·塞荷（Michel Serres）著、（法）马当·勒葛侯、（法）斯文·欧托力访谈：《米榭·塞荷的泛托邦：从沟通信使荷米斯到一手掌握世界的拇指姑娘，法国当代哲学大师的跨界预见》，陈太乙译，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2019年。

参考文献

- [1] [美]玛莎·努斯鲍姆，著。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M]。肖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58。
- [2] [6] 苏德超。“文科无用”论、人工智能与新文科的出路[J]。新文科教育研究，2025（1）：72，76-77。
- [3] Foucault M.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A]. in Bouchard D. F. ed.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40.
- [4] Mol A, Mesman J. “Neonatal Foo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ory: Some Questions of Method”[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96 26(2): 419-444.
- [5] [20] Foucault M. *L'ordre du discours: Leçon inaugurale au Collège de France prononcée le 2 décembre 1970*[M]. Paris: Gallimard, 1971: 13.
- [7] [27] [38] [法]米歇尔·塞尔，[法]布鲁诺·拉图尔，著。我不想保持正确：拉图尔对塞尔的五次访谈[M]。顾晓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275，230-233，279-281。
- [8] [10] 郭贵春，梁德柱。大语言模型应该有“内在的语言生成能力”吗？——论乔姆斯基批评 ChatGPT 的局限性[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5（1）：1，7。
- [9] 赵汀阳。人工智能还给人类的思维难题[J]。中国社会科学，2024（8）：101-123+206。
- [11] Strathern M. “Relations”[M/OL]. 2023, in Stein F ed. *The Ope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http://doi.org/10.29164/18relations>, accessed December 21, 2025.
- [12] [法]甘丹·梅亚苏，著。有限性之后：论偶然的必然性[M]。吴燕，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202-206。
- [13]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视差之见[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26，59。
- [14] [19] [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著。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4-5，7-11。
- [15] [17] 袁蓓。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J]。现代哲学，2016（4）：18。
- [16] [法]阿兰·巴迪欧，著。存在与事件[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33-40。
- [18] 江苏省科协。GPT-4 帮陶哲轩解题、证明数学定理：数学真要成为首个借助 AI 实现突破的学科了？[EB/OL]. 2023-07-05. 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746495，检索时间：2025-05-14。
- [21] Tsing A. “From the Margins”[J].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4 9(3): 279-297.
- [22] Strathern M. *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6.
- [23] Wagner R. *The Invention of Cultur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9.
- [24] [法]布鲁诺·拉图尔，著。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M]。陈荣泰，伍启鸿，译。中国新北：群学，2019：193-194。
- [25] Strathern M. *Partial Connections*[M]. Oxford: Altamira Press, 2004: 22.
- [26] Cornelissen J, Gehman J, Faraj S, et al.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the Future of Organization Theory”[J]. *Organization*

Theory, 2024 5(1): 1-15.

- [28] Serres M. *Rome: le livre des fondations*[M].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83: 212-215.
- [29] [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著. 布罗代尔与综合学科: 一位没有听众的布道人? [A]. 张振江, 译. // 陈恒, 耿相新, 主编. 新史学(第二辑)·布罗代尔的遗产[C].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4: 9.
- [30] 孔令昊. 论中国环境史学科范式转向[J]. 云南社会科学, 2023 (5): 159.
- [31] Rai A. “Explainable AI: from black box to glass box”[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20 48(1): 137-141.
- [32] 春日直樹. 人類学と社会学の未来に向けてのメモランダム[J]. フォーラム現代社会学、特集I: Teaching Sociology, イメージとしての社会学, 2005 (4): 18-25.
- [33] Haraway D.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3.
- [34][35] [巴西]保罗·弗莱雷, 著. 被压迫者教育学[M]. 顾建新, 赵友华, 何曙荣,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1, 34.
- [36] [法]米歇尔·塞尔, 著. 拇指一代[M]. 谭华,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13-114.
- [37]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著. 后人类[M]. 宋根成,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6.

On the path of “Non-modern” new Humanities Research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ONG Ling-hao¹, WU Hai-chao², TANG Bin-bin³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Beijing 100081, China;

2.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lin), Jilin Changchun 130118, China;

3.Junior high school, Ivorist School (Hunan), Hunan Yueyang 414000,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utilitarian” tend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has put it at risk of being abolished, and the questioning of “uselessness of humanities” is rampant. Humanities have always faced the basic problem of “meta-reflexivity” and are not applicable to the so-called “scientific” standard. The “questioning of the humanities” is obviously untenable. However, the “question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of humanities researchers” questions the innovation of related research by humanities scholar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itself. The problem of “meta-reflexivity” makes humanities research always follow a “non-all” log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scal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but it cannot provide the only Alethia. “Modern” humanities violates the “non-all” logic in action, and its coupling model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ts the “arborescence” model, which show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parts” by the only fictional “Whole” (Authority). “Non-modern” new humanities recognize the “non-all” logic, and its coupling model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ts the “rhizome” model. It imagines the “Whole” by standing on the “parts” and always maintains an open attitude towards diversified “perspectives”. If “Non-modern” new humanities research wants to build its own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must at least follow the following two strategies: the first is to cultivate “Non-modern” new humanities thinking and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heuristic”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second is to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ut always maintain a critical spirit, reflect on the “given things” on which researcher relies, and always open up space to “others”. Only in this way can “Non-modern” new humanities,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on the various shortcomings of “Modern” humanities, always embrace contingency and uncertainty,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and its own research scope, and thus participate in more abundant academic topics to cope with the various cris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human civilization toda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n-modernity” new humanities research; logic of “non-all”; “heuristic” knowledge production;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